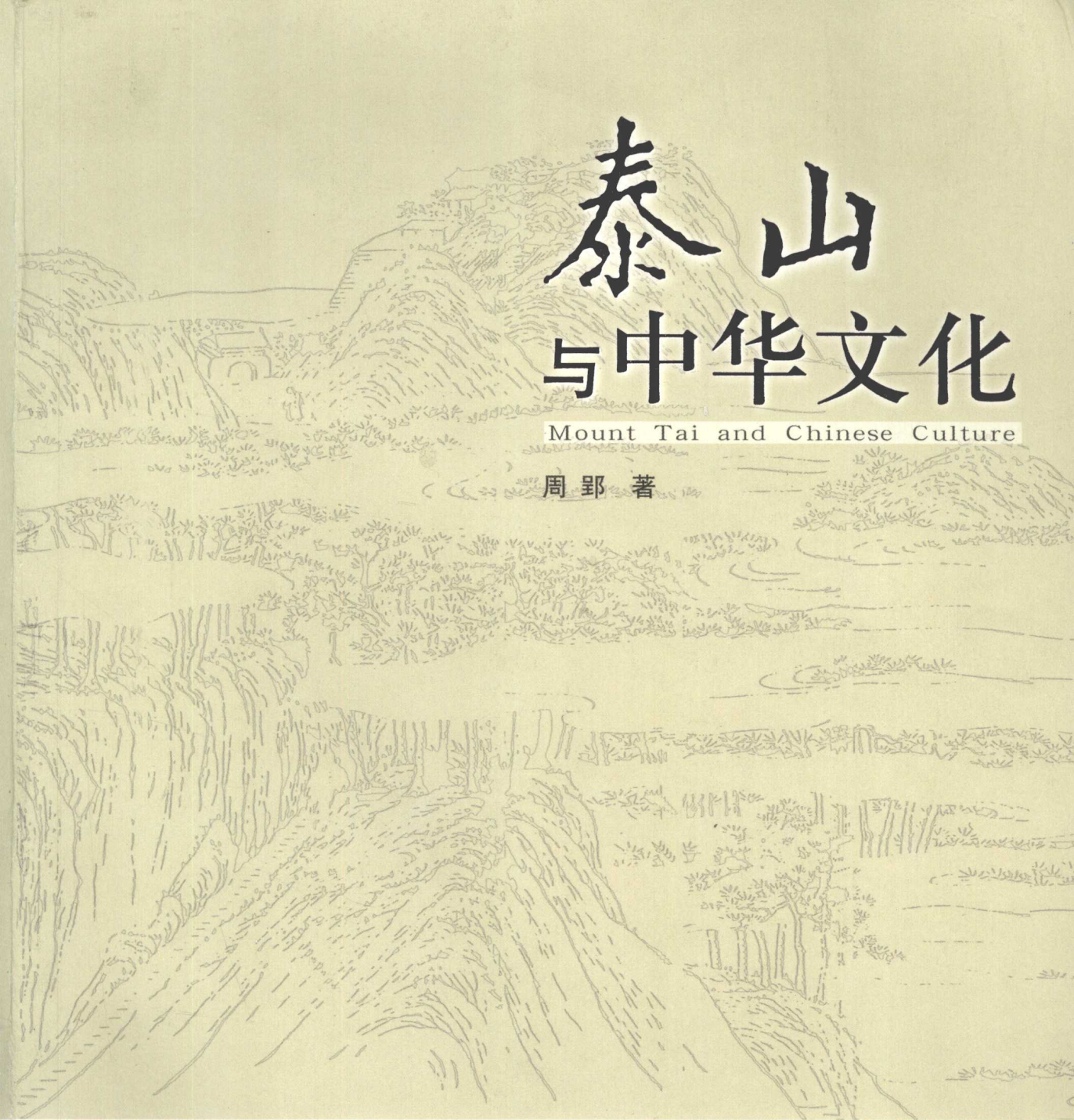




泰山 与中华文化

Mount Tai and Chinese Culture

周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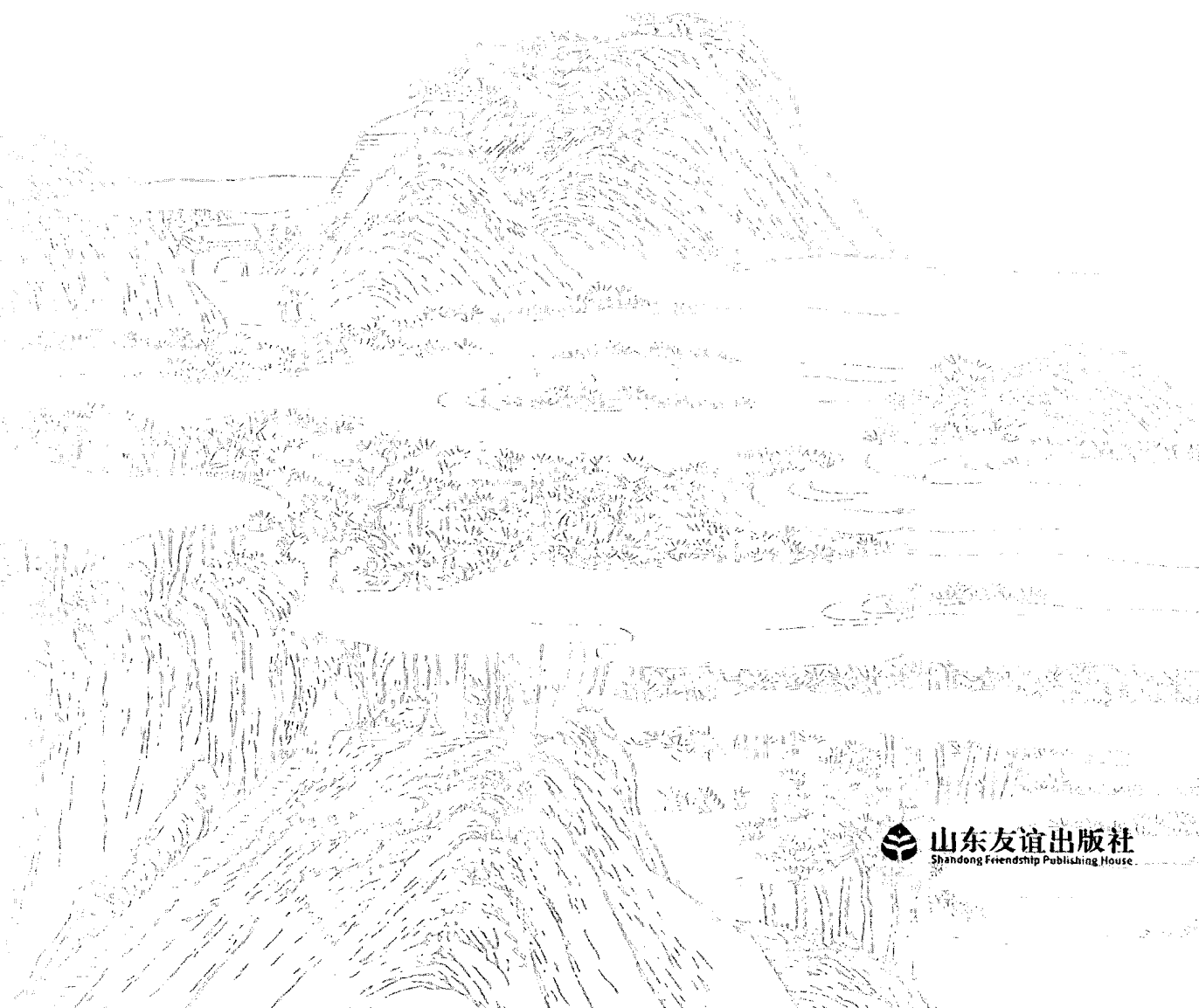


山东友谊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泰山 与中华文化

Mount Tai and Chinese Culture

周郢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泰山与中华文化 / 周郢著.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80737-667-5

I. 泰… II. 周… III. 泰山-文化-研究 IV. 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5518号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756 82098142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83mm × 255mm

印 张: 25.5

插 页: 4

字 数: 460千字

定 价: 56.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陈尚君

周郢君编近年论文为《泰山与中华文化》，嘱我为序。我对泰山文化素无研究，平生也仅在1987年曾登览泰山一次，但有感于周君二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为泰山文史研究所作之贡献，觉得难以竣拒，因而答应写一些感想，权以尽责。

十年前我正做《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时，因为查到山东有后梁刘郢石刻的记载，从媒体知道周郢对相关文献的熟悉，因而曾多次通信，承他将有关石刻录文见示，我总以为他是一位耆年硕学的前辈。承他赠我新著《周郢文史论文集》和《明代名臣萧大亨》，我才惊讶地发现他还年未而立，但已经能够如此卓然自立而有著作成一家言，在目前一般重点大学或研究院所也不多见。直到2007年在西安碑林开会期间，我方有机缘与他见面，并承他告知就学经历和工作现况。周郢出身于泰安的文史名家，他也早通诗书，从十几岁即开始文史文章的撰写。但他没有能走现在一般青年学子以高考入名校、获学位而在体制内教学科研的道路，而是依靠自学以探讨学问，以求继承先人之志业，开拓泰山研究的新境。当然，这样特立独行的求学虽然成就了他在治学道路上的早慧初成，但在个人经历方面也增加许多曲折风霜。好在他的成就和能力最终得到伯乐的赏识，得以担任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研究员，专职从事研究工作，并获评为泰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对此，我很为他感到高兴。同时，我也觉得现在的高校学位教育是为培养社会广泛需要的一般人才而设置专业的，但如文史研究这样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特殊领域，并不是仅通过一般教育就可以造就人才；而千年文化的深厚积累，让许多年青才俊也可以通过自学或者家学得以成才。我在上海就认识许多这样的年轻朋友，他们在旧体诗文或传统文史方面的学养远远超过大学里的一般就学者，但因为学历的缘故要进入体制内从事专业研究，则途径甚少。就此而言，周郢君是很幸运的。我觉得，社会应该给予如周郢这样的杰出人才以更多机会。

周郢泰山文史研究坚持至今已经25年，始终如一，心不旁鹜，堪称难能可贵。

他的成果,已经结集的有《周郢文史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泰山文史丛考》(泰山档案馆1991)、《泰山历史纪年》(泰安市档案馆1989)、《泰山五千年大事记》(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2)、《泰山志校证》(黄山书社2007)和本书,以及其他一些专著和上百篇论文,可称丰富,在泰山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我初步披览,感到他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方文献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立足泰山基本史料的整理和发掘,充分尊重和吸取前人研究泰山的成果,充分利用当代中外学术在各个学科所取得的成就,全方位地关注泰山研究,从整体上将泰山研究提升到当代学术的先进水平。为此,他付出的努力也是巨大的。仅从他的博客所记录的他最近两个月的行迹来说吧:8月8日,自黄西河口上龙角山,历时12小时;11日,寻访满庄南留荆山碑石;13日,参观济南李清照、辛弃疾纪念馆;17日,寻访肥城汶阳三娘庙;21日考察徂徕北望村三官庙;9月1日,考察历城高而乡杨家寨与魏花寨;13日,考察长清店台古驿道石桥;15日,再寻拔山黄姑庵;26日调查大藏岭红门石;10月15日,到新泰市汶南镇太平庄考察《西游记》文化遗迹大圣庙。这当然还不是他的全部工作,但我相信他坚持20多年以苦行精神行走基层,寻访发掘能够有资泰山研究的第一手文献,是他能够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内在原因。地方学者在研究地方文献方面,有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巨大优势,即可以充分利用熟悉地方、及时实地寻访的有利条件,得到遗弃在荒山野郊的珍贵资源。当然,地方学者为此付出的巨大辛劳,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比方我做唐代文献,力求搜集材料的完整准确,因此对于已经发表的所有成绩都加以网罗,特别是近年各地整理发表的地方石刻类文献。我的途径只不过是购买图书和利用图书馆复制文献,所付出很有限。正是有如周郢这样长年累月坚持田野调查的学者,才得以构筑地方文献的完整体系。对于他们的工作,我们不能不心存感激。

中国地方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至少在汉晋之间的《吴越春秋》、《襄阳耆旧传》、《华阳国志》等书中就已经趋于成熟,到六朝时期地方志编纂蔚成风气(详东京《东方学报》12卷青山定雄《六朝时代的地方志——其撰者和内容》,1941),唐代更规定各地三年一次将地方变动报呈职方司(详《唐会要》卷五九),唐宋以降方志编纂形成完整的制度,留存至今的民国以前方志约近一万种。山志编纂也在唐宋时期形成规模,并延续至今。最近三十年间各地的方志编纂成就更为世人所瞩目。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也要指出地方文献编纂中的常见缺憾,大约一是带有强烈的弘扬乡邦文化的使命感,在史实认定和文献处理方面不免因感情因素而造成偏

颇,近年各地为争夺所谓名家文化资源就是突出表现;二是局限地方,眼界狭窄,不能在世界或全国立场上认识地方文化的价值,作出公允的评价,经常无限拔高,难以取信;三是仅知地方故实,编排罗列,研究未深入,考订有疏失,以致所著方志水平不高。这些问题,在近年新编方志中尤其突出。我在向学生讲解地方文献的时候,每每以此告诫他们对地方文献一定要小心取舍,认真鉴别,就是自己多年来经常受困于方志讹误而得到的教训。周郢的泰山文化研究,我不敢讲完全没有一般地方文献研究的局限,但我感觉他很自觉地在注意挖掘第一手文献的同时,注意用现代科学的科学态度来作出判断。如在《泰山志校证》中,对该书收录的孔子《丘陵歌》,既指出此诗出于《孔丛子》,前人称此为“百代咏岱之祖”,又引前人考证以明其伪;对谢道韞《泰山吟》,即引今人邹志方的考证,“认为本诗系咏车骑山(在浙江上虞西南),与泰山无涉”;注谢灵运《泰山吟》,即认为“灵运未尝至泰山,此诗系用乐府旧题”。这些都是在文献判读时客观公允的态度,不作人为的维护和刻意的拔高。在涉及具体事实时,又能广征文献,以求真相。如雍焯《岱岳志叙》首句“岱往无志”,周郢笺注时则广寻文献,指出在东汉时已有《泰山记》之著,并辑录佚文,宋元间有数种泰山专书的出现,泰安的方志也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收录在《周郢文史论文集》中的《新发现的羊氏家族墓志考略》、《唐“鸳鸯碑”史事新笺》、《宋天贶殿位置考辨》、《泰山与中外文化交流》,收录在本书中的《泰山石刻与史学研究》、《东岳庙在全国的传播与分布》、《泰山东岳庙会新考》、《李白徂徕之隐与泰山之游新探》等文,也都是取资丰博、考证细致的论文,可以见到作者深入专题研究的能力。同时,我感到周郢虽以做泰山文史为主,但始终保持当代学术的前沿意识和通观文献的全盘眼光。他在早期所作《岱宗千古校史卷——泰山史料整理刍议》(收入《周郢文史论文集》)中,建议从故官明清档案、南京民国档案和泰安地方档案中加以挖掘,对于史籍资料整理,也提出从正史资料、编年史资料、地理志资料、政书资料、类书资料、杂史资料、佛道史籍资料、少数民族资料和域外史籍资料辑录整理的规划,对泰山著述也有汇编目录和编纂丛书的构想,诗文资料则拟编纂全岱诗文,其他资料还列举碑帖、谱牒、舆图、报刊等方面。我感到他对泰山史料多年的发掘和积累,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展开的,如果能够在这一规划下完成,无疑可以为泰山文史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展开全新的格局。

一般学者的出道多数在25岁以后,经历近三十年的努力,已近老境,虽然学识充沛,但精力已经不济,很难再作大的开拓。而周郢出道早,积累厚,今年还不到40岁,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我也感到他的研究方式和我们这一辈已经有很大的

不同。我在这里特别要推荐他的博客“泰山周郢的BLOG”(<http://blog.sina.com.cn/zy4821330>),收录博文已经超过500篇,详尽记录了他最近几年为发掘泰山文献所经历的艰辛和愉悦,提供了他的大量最新的文献收获和研究心得。收录在本书中的一些文章,也是在博客中首先披露的,这在当代学者中并不多见。我一直认为,网络的普及为学者发表最新的成果,为文献类著作听取反馈意见和反复修订,为学者之间的及时沟通,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平台,只是现在许多学者限于评估体制的制约,还是将纸质文本作为首发的渠道,只是在纸质文本发表后,方选取若干公诸网络,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失去了学术交流的第一时间节点,一旦公布也很难再作修订。周郢的做法,我是很赞同的,我相信这也是今后学术论著发表的方向。

昨晚看中央电视台转播十一届全运会以“一山一水一圣人”为中心的文艺演出,当看到在杜甫《望岳》诗句引导下出现泰山雄姿时,我也感到由衷的自豪。正是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的牺牲贡献,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泰山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周郢在本书最后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已故学者徐北文先生对于建立“泰山学”的设想,徐先生从区域研究和大文化研究两个层面展开论证,周郢则从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加以阐发,提出“将来的研究将日益走向‘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绾合。更多的学术课题将立足于‘山体’,取得实证的突破,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由‘小泰山’而‘大泰山’,最终将结论推衍到一种‘大文化’、‘大义理’的层面。”对此我深表赞同。周郢君以前二十多年为泰山文献和历史研究作了极其可贵的努力,现在自觉地认识到今后开拓进取的目标,以他的才分和努力,以他依然年青的体魄和激情,我相信他还会取得更杰出的成就,为“泰山学”的研究奠定基石,开拓方向,取得具有世界意义的建树。

2009年10月17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目 录

序	陈尚君
一、泰山与中华国山	1
中华国山论——兼议泰山的“国山”地位	3
泰岱沧桑五千年——文化分期与历史演进	17
二、泰山与史学研究	35
泰山石刻与史学研究	39
泰山“无字碑”与秦阙文化	57
王莽封禅玉牒索隐	61
全真道与蒙元时期的五岳祀典	67
从泰山龙脉之争看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76
泰山和圣祠与历史上的柳下惠崇祀	86
《左传精舍志》与清代“左邱公案”	93
羊祜故里在新泰	100
羊欣与羊氏文化	106
《郭琰墓志》中“下番海船”与明初下西洋之役	117
《重开山记》碑中“高丽僧”考	121
英雄还是罪人——张遇留事迹新考	125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蔡士英事新证	133
东岳庙在全国的传播与分布	140
岱庙大殿三考	169
从历代文献看岱庙壁画的时代、作者及内容	176
汉“泰山宫”考	186

三、泰山与文献研究	189
乡献证史——地方文献与文史研究	191
《泰山雅咏》：《永乐大典》中的泰山佚书	200
明《泰山志》整理论略	208
正续《四库总目》中之泰山著述提要述评	217
四、泰山与民俗研究	227
泰山东岳庙会新考	230
“碧霞元君”神号源起考	243
碧霞元君“生辰”考	253
“石敢当”与泰山文化	259
泰山千年香客店	266
泰山《孝经》石刻与舍身风俗	275
五、泰山与文学研究	281
孟姜女故事与泰山	285
牛郎织女故事与泰山	292
李白徂徕之隐与泰山之游新探	295
新发现的元曲家杜仁杰史料辑证	305
孔尚任自号“云亭山人”考——兼述一则新见孔尚任佚文	317
《水浒传》与泰山文化	320
《西游记》与泰山文化	332
《红楼梦》与泰山文化——从“泰岳阴司”到“太虚幻境”	345
《聊斋》《红楼》中林四娘本事新证	358
杨家将故事与泰山	366
六、泰山与当代学术	377
泰山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379
泰山文化的“两个世界”——徐北文先生与“泰山学”	390
后记：重读泰山	399



一、泰山

与中华国山

现代文化名人易君左、老舍及当代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家,都称泰山为“国山”。在中国众多的名山大岳之中,为什么独有东岳泰山能够荣膺“中华国山”的美誉呢?这与泰山在中华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东岳泰山不但凝结出个性独特、内涵丰厚的文化硕果,而且对它所依托的中华大文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至郭沫若先生用“中华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读随园诗话札记·泰山》)之词来评估这一名山文化。今以“国山”及“文化分期”为主线,对“泰山与中华文化”的因缘作一初步探索。

中华国山论:名山大岳,被世人认为足以象征其国家文化、民族精神者,被尊为“国山”。中国“国山”之名起源于先秦,民国及当代均有评选“中华国山”之议。本文分别从历史、地域、民族、信仰、精神等五个层面,论证了“国山”应具备的要素,最后认定中华山岳之中,惟有东岳泰山具有“国山”的地位,“国山非泰山莫属”。

泰岱沧桑五千年:泰山文化绵历五千载,其文明传承迄未中断。如从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特征加以区分,大体可分为五大历史时期:先秦秦汉为“政治山”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宗教山”形成期,隋唐五代为“文化山”形成期,明清为“民俗山”形成期,近代以来为“精神山”形成期。并参以上述分期,对泰山历史文化历程进行简述。

中华国山论

——兼议泰山的“国山”地位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象征。这其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国旗、国徽、国歌、国花、国鸟之外,还有一项重要标志,那便是“国山”。

为什么会以一座山岳来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呢?对此,民国时期历史学家许兴凯曾作诠释:“国是个概念,需要一个具体的东西来代表他。这个东西不是河,就是山。比如德国的莱茵河,日本的富士山。我们中国也以河山比譬国土。”(《泰山游记》17页,北平读卖社1934年版)当代民族史家徐杰舜先生也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精神形式的表现,有物质形式的表现,山川河流是物质形式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汉民族发展史》第九章《泰山、长城、大运河——汉民族文化的象征》,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而举国山岳之中,能被认为足以象征其国家、民族精神者,便是人们习称的“国山”。

中国“国山”之名起源很早。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之上,便有“西北海之外,……有禹攻共工国山”(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29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记载,不过当时的所谓“国山”,只是一部落圣山而已。延至三国时代,开始出现了封建王朝法定的“国山”,《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记载,吴末帝孙皓因境内吴兴离里山(今江苏宜兴市境)有“石室”之瑞,遂遣人诣山行封禅大礼,并封离里山为“国山”。其他历代王朝虽未确定“国山”名目,但在国家礼典中却一直存在以五岳为首的山岳祭祀体系。居五岳之首者(一般称为“宗山”或“首山”),大略相当于“国山”之地位。到了近代,随着现代国家观念的加强及民族观念的自觉,评定中国“国山”呼声日高,民国著名学者易君左、王德林曾撰刊《定泰山为国山刍议》,奏响了评定“国山”的先声。20、21世纪之交,“国山”评选再次被提上社会论坛,各界人士纷纷建言,提出各自的“山选”;亚太环境保护协会(APEPA)中国委员会等12家机构还组成“中国名山大川联合研究会”,拟通过对国内外约40个城市开展规模性随机口碑调查,力争推选出深孚众望的“中华国山”。

那么,在中国境内的名山大岳中,有哪一座山堪当“中华国山”呢?对此,现当代学者易君左、季羨林、任继愈、杨辛,作家老舍、贾平凹及旅游策划专家王雷亭、宋体金等先生均曾先后表述见解,各具睿见,引人深思。今拟继诸家之后,对“中华国山”应具备的要素以及“国山”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关目,试作阐述。

一、“国山”与中华历史

“中华国山”首先应具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历史的连续性”。即：我们所认定的“国山”，必须是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被大多数中央政权承认的域内第一山。

在中国境内曾有多座著名山岳，先后获取“国山”或“宗山”的崇高地位。如宜兴离里山，东吴天玺元年(276)，吴主孙皓封禅于此，尊山为中岳，改名为“国山”，并立《国山碑》以告谕天下；辽东北龙山(今辽宁朝阳县境)，十六国时期慕容氏前燕政权尊此山为“宝山”，筑城号“龙城”，建都其中；中岳嵩山，武周一朝尊其山为“神岳”，锡神以帝号，并将封禅地点由秦汉以来的泰山，改迁至中岳举行，使嵩山取得域中第一的显位；吉林长白山，为满族发祥之地，清朝定鼎，遂以其山为第一山，排名有时列五岳之上。

这些名山虽都曾被推上“国山”(宗山)的宝位，却为时甚短，未成定制。究其原因，或因其王朝享祚短暂，勃兴遽亡(如武周)，其礼制未能得以延续；或因其政权割据一隅，版图局促，制度未能推广全国(如东吴、前燕)；或其王朝将本朝祀典与传统的首山观点进行调和，等于变相认同了固有首山的地位(清代，详后论)。要之，在历史上虽有上述名山入围“国山”之列，但总体看来，均属“变格”而非“正格”。

如从开篇所述“历史的连续性”来讲，纵览禹域之山，似只有东岳泰山符合这一项要求——

①从一州之镇到九州之望 早在上古时期，泰山便是重要部落的聚居地，尧舜时期已将岱宗作为巡狩四方(四岳)的首巡之地。夏商二代都继承上古遗规，相继东巡泰山。周代立国后，在大一统政治观念的影响下，将天下九州各确定一座名山为其镇山，其中所定兖州的镇山便是泰山，《吕氏春秋·有始览》、《淮南子·地形训》所载禹域“九山”，泰山均名列其中。可见泰山作为一州之镇的政治地位，早在三代时已然确定。

也是自西周起，中国的山岳祭祀开始制度化和等级化，规定惟有周天子与鲁公方有权致祭泰山，进一步提升了泰山的地位。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远千里，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云：“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史记正义》释云：“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自此封禅必于泰山成为定格，泰山作为中国名山的代表，在大一统王朝中首度得到确认，也即从一州之镇开始升格为九州之望。

②从四岳之一到五岳之首 “岳”者，山之尊者之称。一般认为，“四岳”的观念在上古已现雏形。《左传·昭公四年》有“四岳三涂”之语。《尚书·舜典》所载大舜所巡四方之山，可能

便是“四岳”的先声。而泰山不仅名列四岳之一,且因是君主首巡之地,地位已有超出其他三岳之势。

五岳制度定型于西汉。汉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极力利用五岳来增重君权,使五岳地位日趋重要。汉武帝前后八次封禅泰山,崇祀之隆,超越嬴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遂使泰山地位凌驾于其他四岳之上。至汉宣帝时,诏令定五岳之制:“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泰山不仅名列五岳之首,而且祭祀规格亦明显高于其他四岳。这是首次以国家政令形式,明确了泰山作为中国第一山的神圣地位。这一地位在新莽与东汉两朝都未改易,东汉光武帝、章帝、安帝等皆曾封祀泰山。东汉五岳祭祀排名,也是以泰山为第一(《宋书》卷十五《礼志》)。所以《汉书·五行志》称:“岱宗,五岳之长。”汉末应劭亦论称:“东方泰山,……为五岳之长。”(《风俗通义全译》37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由于这种种因素,最终促使泰山在两汉之际,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山岳。

③从王朝宗山到民国国山 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有山川崇祀制度,列祀典之首者,尊之为“宗山”。泰山自秦汉时成为“宗山”后,除去个别时段(如武周)外,基本上都延续着这一地位。

在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中,不仅曹魏、两晋等中原王朝完全宗承先代的祀岱制度,就连十六国中的后赵、前秦、南燕及北朝魏、齐也莫不赓续泰山庙祀。隋朝统一南北后,隋文帝亲赴泰山,设坛致祭,既延续了秦汉崇岳的传统,又开启了唐代封岱的先声。唐高宗、唐玄宗都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玄宗并加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继之又在御制《纪泰山铭》中,申述了其山“五岳之伯”的首山之位,促进了泰山信仰在各地的广泛传播。继起的五代政府也均曾发布崇祀泰山的文告,沿袭了唐代的泰山祀典。

宋立国之初,便下旨迁县城以就岳庙,使山城一体、庙城一体,以此加强对泰山的崇祀与管理。宋真宗出于政治需要,在位期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泰山封禅。告成之后,先后加封泰山神为王、为帝,使泰山神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一级。金廷入据中原后,金世宗下诏“祭东岳于泰安州”,“其封爵并仍唐、宋之旧”(《金史·礼志》),且视之为金朝的保护神山,从而恢复了泰山自北宋灭亡后中断的“宗山”之祀。蒙元汗廷起于朔漠,起初对泰山信仰并未接纳,但元朝统治者逐渐接受汉法治国的理念之后,遂将泰山祀典作为“尊汉法”的一例而大加钦崇。元世祖加封泰山神为“天齐大生仁圣帝”,这是历代泰山神号中最为显赫的一则。同时对泰山的遣祭活动,亦终元不废。

明太祖登基之初,宣布取消历代所加泰山帝王封号,只尊其为“东岳泰山之神”。此举意在使泰山之神权更加神秘尊贵。同时明廷还继承自唐以来的遣使致祭制度,三百年中共达百次之多。永乐之后明廷奠都北京,泰山以“密迩京师”,政治地位得以进一步巩

固。明孝宗在御制《东岳庙碑》中礼赞泰山为“群岳之长”，称其“奉我胤祚，光我化甄”，再次昭示了泰山为大明之“宗山”。

代明立国的清政权，与明朝有着截然不同的信仰传统，满族兴起于长白，称斯山为“皇清亿万年发祥重地”，故山岳祀典也以长白山为第一。清廷入主中原后，在文化上加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但如何协调两种不同的“宗山”信仰，便成为困扰清廷的一项政治难题。为此康熙一方面宣称“泰山山脉来自长白”，从地缘上来说，满汉实为一体，有着共同的文化根脉，无需再分彼此；另一方面亲祀泰山，行二跪六叩之礼，其礼仪之尊崇，已超越明代帝君。其孙乾隆更十次巡幸泰山，六次登祀岱顶，创下了帝王祀岱的最高纪录。乾隆还在碑记中宣称：“泰山位长群岳，称宗最古，表望最尊。”这种表述，等于变相认同了泰山在清所居“宗山”之位。

封建帝制覆灭后，如何看待昔日的王朝“宗山”，引起社会的争议。许多学者认为，泰山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虽被封建统治者神化，但就其本质而论，却凝聚了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丰富内涵。如历史学家许兴凯指出：“我们中国也以河山比譬国土。这河，我以为就是黄河；这山，我以为就是泰山。……泰山可以代表我们中国。”（《泰山游记》17页，北平读卖社1934年版）基于这种对泰山的重新评价，易君左、老舍、芮麟等人倡“定泰山为国山”，藉以“恢复已失去之民族自信力，唤回将散而未散之国魂，惊醒国民醉生梦死之迷梦，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易君左、王德林《定泰山为国山刍议》12页，泰安立师范讲习所1933年版）。“国山”之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反映了现代人对泰山的一种全新评估与认识。

通观泰山在中华五千年中的历史变迁，从“镇山”、“岳山”、“宗山”，直到拟议“国山”，其与国家政权关系之密，历史延续之长，社会影响之大，确乎是其他诸山难以比肩的。其情形诚如易君左等先生所云：“是泰山早有国山之实，而特无国山之名耳。”（《定泰山为国山刍议》10页）国山徽号，泰山实当之无愧。

二、“国山”与中华地域

其次，应该是“国山”影响地域的广大性。顾名思义，“国山”的影响不应限于所在区域，而应是全国性的。古代山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名山信仰上。有的名山虽在本地（一县或数县，一省或数省）具有较大影响，崇信者甚众，但超出这一区域，便知者不多，或只知其名而不加崇祀。如江西新喻有蒙山，山势灵秀，然元人梁寅《蒙山赋》称：“蒙山者，吾州之峻也，然郡志仅传，名不远著”（《石门集》卷一），即是一例。其他山岳如安徽黄山、四川峨嵋、陕西终南、湖北武当、江西庐山、浙江天台等，或以自然风光，或以人文胜迹，闻于

天下,但作为一种名山信仰,只限于其山所在区域,以名山庙祀为例,在黄山便无终南神庙,反之亦然。五岳中的恒山、华山、衡山、嵩山之信仰不限于本土,庙祀遍及数省,如《广西通志》卷四二《坛庙》载:在广西果化土州、侏伦土州、结安土州、都结土州、向武土州、下雷土州、湖润寨、融县等州县寨中均建有南岳庙,可见传播之远、崇祀之盛。不过总体说来,上述四岳庙祀范围都未能遍及中国全境,如北方州县中无建南岳庙者,南方州县也无建北岳庙者,而即使在南方各省,南岳庙建置也未形成官方定制。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四岳及其他域内名山均未形成全国性的信仰。因此,这些名山大岳可视为一方之望,而不具有“国山”的资格。

影响真正能遍及中国全境者,通观域内名山,惟有一座东岳泰山。

泰山信仰首先兴起于远古山东,本属山东半岛的地方信仰。由于这一地区为中国文化重心所在,其崇祀渐为中原王朝所接受,泰山信仰也由中原、北方继而又扩展到江南与边疆,由地区性崇拜演变为全国性信仰——

①从山东到中原 泰山信仰首先兴起于远古山东的东夷部族中,随着夷夏交融而扩展到中原地区。清顾炎武考谓泰山“鬼论兴于汉世”,知两汉时期,泰山治鬼的观念已在中原盛行。唐代东岳行祠制度开始后,庙祀由山东而渐及北方各州县,唐代的河南、河东、河北等道——也就是今天山东、河南、山西、河北等地,都是较早建立东岳庙的地区。这一区域,也是泰山信仰的肇始区域。

②从北方到南方 泰山信仰传播的第二重区域,是中国南方地区。五代两宋时期,由于江南开发与中原移民,泰山信仰由北而南传播,东岳庙祀在南方开始兴盛。特别是宋室南渡,将东岳崇祀在江南大力推广,更使得南方一跃成为泰山信仰的又一重镇。

③从内地到边疆 随着历代王朝对边疆的开发,泰山信仰也开始向边境各地传播。元代,东岳庙首先构建于漠南蒙古;明立国后,云南、贵州、广西、宁夏等地先后纳入版图,包含有东岳庙的官方祭祀体系在上述地区得到推行。明清之际,南明郑成功部收复台湾,建东岳庙于台南,又将庙祀远播至宝岛。清廷入关后,满汉文化日益融合,东岳庙遂大兴于东北。此后清朝先后平定新疆、西藏,促使东岳庙祀又推广到这些边陲地域。

上述泰山由中原向四周恢拓的过程,正是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传播的一个具体展示。在中国的众多名山中,只有“东岳之庙,遍于天下”(明孝宗《重修东岳庙碑》)。其信仰地域的广泛性,是其他名山所无法匹敌的。

④从中国到世界 “国山”除在本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声望外,同时须在域外邦国也有巨大的影响。如希腊国山奥林匹斯山,是神话中宙斯等众神所居,随着古希腊神话蜚声世界,奥林匹斯山遂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名山。日本的圣山富士山更是如此,富士山是日

本的最高山峰,《富士山麓史》称其山“是日本的象征、世界独一无二的名山”。日本人奉它为“圣岳”、“不二山”,它也一直是日本文学艺术讴歌的主题。其“不死仙山”的形象在世界各地深入人心,看到此山,便自然会联想起大和文化。纵观中国的各大名山,能与奥林、富士相媲美的惟有泰山。泰山之名在唐代以前便为日本、朝鲜等邻近邦国所熟知,泰山神信仰还在日本平安一朝(794—1185)传入东瀛,后来成为在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国神祇;中国以泰山为首的“五岳”制度亦东传朝鲜,新罗王朝曾仿效此制,在国中设置五岳。泰山石敢当、泰山娘娘等信仰还分别传至琉球、越南等地,在当地生根发芽。封禅大典亦远播至阿拉伯世界,在大食人心中留下长久的记忆。在西方,泰山同样声名卓著。早在6、7世纪,东罗马史学家席摩喀塔便在著书中提到“泰山”。17世纪,泰山之名已被标注在意大利人利玛窦所绘《坤輿万国全图》上。近代以后,泰山文化更引起西方汉学家充分关注,19世纪美国学者威廉蒙博士首先评说泰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山”(见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137—138页,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此后法国沙畹、德国卫礼贤、俄国阿列克谢耶夫等汉学大师都对泰山作了深入研究和高度评价(参见《泰山与中外文化交流》,载《周郅文史论文集》278—323页)。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访华介绍法兰西圣山圣米歇尔山时,将其称为“法国的泰山”,足见泰山在西方的知名度。在当今世界,泰山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被纳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这是第一座被列入此项名录的中国名山,显示了国际社会对泰山价值的充分肯定。可以说,泰山,只有泰山,才能同时在东西方世界中享有如此盛誉。

三、“国山”与中华民族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化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因而在“国山”的确立上,必须体现全民族的共同信仰。

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均有山岳崇拜的风俗,如《后汉书》卷九十《乌桓传》记乌桓族:“……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又《辽史》卷五三《礼志》记契丹族:“冬至日,国俗,……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这类礼俗,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也多有存在,如西藏藏族之与冈仁波齐山(雪灵山),四川藏族之与贡嘎山,内蒙古蒙古族之与腾格里山,海南黎族之与黎母山,云南彝族之与三尖山,云南白族之与石山,东北鄂伦春族之与奇石岭,云南佤族之与公明山(鹿埃姆山),东北满族之与长白山。这些山岳都被视为神山、圣山而广受尊祀,但其影响多限于一二个民族,似可视之为“族山”,而不宜名之为“国山”。